

紀念王鍾翰先生百年
誕辰學術文集

秦美川敬題



紀念王鍾翰先生百年
誕辰學術文集

秦美利敬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纪念王锺翰先生百年诞辰学术文集/编委会选编.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 - 7 - 5660 - 0476 - 5

I. ①纪… II. ①编… III. ①中华民族—民族历史—文集②中国历史—清代—文集 IV. ①K28 - 53 ②K249. 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8548 号

纪念王锺翰先生百年诞辰学术文集

主 编 编委会
责任编辑 黄修义
封面设计 汤建军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65
字 数 154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60 - 0476 - 5
定 价 30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纪念王锺翰先生百年诞辰学术文集》

编委会名单

陈 理 王湘云 定宜庄 刘小萌 姚念慈

达力扎布 赵令志 邸永君 柏 桦

目 录

王锺翰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地位（代序）	（1）
明清职官别称条目的增补问题	
——读《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商榷（二）	何龄修（26）
在制度和现实之间：清代的太监	郭松义（34）
明遗民与清初碑传纪年	
——以黄宗羲为中心	姚念慈（42）
清代北京的俄罗斯旗人与中俄文化交流	刘小萌（80）
清代的高墙制度	[美] 黄培（104）
关于清朝遣俄使节的几个问题	[日] 柳泽明（116）
关于朱批奏折制度起源的再思考	[美] 欧立德（127）
清代的京控与叩阍	柏桦（136）
组织、官号与明末清初的满族社会	祁美琴（146）
东征故将与山阴世家	
——关于吴宗道的研究	杨海英（160）
朝鲜使臣见闻记述之康雍史事考评	
——以争储及雍正继位为核心	罗冬阳（174）
清初降臣柳同春的旌赏之路	彭勇（187）
皇太极即位新考	滕绍箴（207）
皇太极设立都察院时间考析	韦泽（222）
论顺治朝科道官与清初弊政	刘丽君（229）
清代河工贪冒考论	刘志松（239）
清代畿辅地区内务府皇庄的征纳	邱源媛（250）
康熙帝诗词中治边思想透析	余梓东（263）
康熙的“中和”之道与康熙朝政治	成积春（273）
从“民情”到“恨官”：18—19世纪山东绅民抗粮动因的转变	崔岷（284）
清末中等社会与民族国家建构	徐永志 李硕（297）

- 晚清时期满族“国家认同”刍议 定宜庄 (304)
- 清末民国时期“旗族”内涵之初探 赵志强 (317)
- 清代外藩蒙古会盟制度浅探 达力扎布 (331)
- 清入关前对外藩蒙古所制杀害逃亡者处罚规定杂考 [日] 冈洋树 (353)
- 清初满洲八旗朝鲜通事官述略 [韩] 任桂淳 俞海燕 (366)
- 清初满蒙关系建立中的重要人物达雅齐考略 杜家骥 (381)
- 古尔布什家系与事迹补证
——以满文《古尔布什家传》为中心 张永江 关康 (387)
- 噶尔丹与五世达赖关系刍探 蔡家艺 (407)
- 回眸蒙藏关系中的几位著名学问高僧 乌力吉巴雅尔 (416)
- 满文档案所见噶尔丹死后清廷、蒙古王公及藏传佛教的关系 ... [日] 楠木贤道 (426)
- 从“获胜”到“败北”：乌兰布通之战史料研析 杨珍 (436)
- 和通泊之役与大清国的边务危机
——以军机处满文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张建 (445)
- 清代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及其意义 吴元丰 (468)
- 清乾隆时期对嘉绒藏区的治理 彭陟焱 (477)
- 清代霍博克赛里土尔扈特蒙古赴藏熬茶活动初探 郭美兰 (487)
-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中蒙古朝覲探究 [美] 贾宁 (497)
- 论清季中国西北回民事件的宗教民族因素 (台湾) 陈旺城 (514)
- 清代蒙藏地区民族立法异同研究 许安平 (520)
- 清朝军机处档案方本：上谕档与有关的方本档案史料 [美] 白彬菊 (528)
- 满洲语文在清朝历史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 (台湾) 庄吉发 (540)
- 《钦定拣放佐领则例》研究 [日] 细谷良夫 赵令志 (588)
- 《满文原档》比较研究
——以天聪六年爱新国大军征略库库和屯及其周边地区史实为中心
..... 齐木德道尔吉 (614)
- 研究土司制度应重视对清代档案的利用 李世愉 (648)
- 从《清史稿·乾隆本纪》巡幸盘山的记载看其史料价值 常建华 (657)
- 再论“三韩山斗碑”有关问题 姜相顺 姜阳 (660)
- 清代多文种合璧文献二三例 江桥 (668)

- 清稿本《新疆四道志》研究 李德龙 (680)
- 《厄鲁特准噶尔王统世系等略说——信仰之车》译注 扎洛 敖见 (692)
- 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手绘蒙古游牧图及其价值 乌云毕力格 (704)
- 江上波夫博士旧藏《清代乾隆期科布多疆域图》 [日] 小沼孝博 (714)
- 从《满文老档》的相关记事看满洲文化中的蒙古—突厥因素 钟 焯 (721)
- 李满住与大金 [日] 河内良弘 (747)
- 论“中国”观的扩大与发展 罗贤佑 (755)
- 大昭寺门楼顶上之经幢铭文考察 [美] 王湘云 (786)
- 宋代西北吐蕃与宋朝的关系 陈庆英 白丽娜 (798)
- 对元代南方民间信息传播的几点认识 [美] 刘元珠 (821)
- 《大兴国寺记》的作者梁相其人 刘迎胜 (830)
- 蒙元时期的欧洲旅行家与“塞里丝误解”的新定式 华 涛 (838)
- 玉树囊谦土司历史考述 陈 楠 (851)
- 焦养直生平事迹考略 尚衍斌 (858)
- 论明代辽东的女真人 奇文瑛 (867)
- 明与女真曹子谷之战考 孟凡云 (877)
- 重新审视清代与世界史的关系 陈支平 (884)
- 史学现代化研究的新探索 徐 凯 (889)
- 古代官箴书与官德研究 岑大利 (893)
- 历代文臣得谥“文正”者考 邱永君 (902)
- 生命尊严与医疗观念四题 冯尔康 (911)
- 清代满洲文化发展阶段论 李治亭 (914)
- 满汉文化交相辉映的艺术经典
——从京剧《四郎探母》说起 关嘉禄 (930)
- 藉海扬帆
——清代满族文学汉文书写之肇端 关纪新 (937)
- 清代宫廷“图塞尔根桌”略考 (台湾) 吴美凤 (947)

-
- 肃慎—女真族系形成发展的民族学研究 赵阿平 (968)
- 象牙雕刻之历史探源 姚 安 (975)
- 试论天坛祭天文化中的和谐思想 张晶晶 (985)
- 赫赫清史大家 巍然一代宗师
- 重读王锺翰《学述》与《清史论集》兼论其学术成就 王俊义 (993)
- 满文《甘珠尔》之发现、研究与再版 [日] 中见立夫 (1003)
- 王锺翰先生学术简谱 赵令志 (1017)

王锺翰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地位

(代序)

今年是著名历史学家王锺翰先生的百年诞辰。先生已于5年前辞世，但他的著作犹在，风骨长存。

自上世纪30年代末投身于史学，直至本世纪初以90岁高龄撰写最后一篇学术论文，先生在清史、满族史和民族史等领域中辛勤耕耘近70年，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他独特的学术风格与成就，给世人留下一笔丰厚而珍贵的遗产。

“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今天我们纪念先生，不仅仅是敬佩其学术成就，更应学习他的为人。

从湘南偏僻之区的农家子，成为著名学者，与先生的人生态度有莫大的关系。最直接可见的原因，当然要数他那天生坚忍顽强的性格，先生确实一生都在艰苦奋斗。而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不拘泥一时一事是非得失的宽广襟怀，以及与时俱进的精神，紧紧追随进步的思潮，也是成就先生极为重要的因素。

纵观先生一生，不论时局如何变化，环境如何艰难，遭际如何困窘，先生始终对祖国和民族抱有坚定的信念，深信必有光明的前途；深信唯有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方能有学术繁荣的未来。正是人生境界的不断提升，先生的学术境界也日益拓展，从当初具体微观的考证，经过将清史研究与满族史相互贯通，最后立足于从民族史的宏观来看待中国多民族统一的分合熔铸，实已臻于博综群科的通方之道。

文如其人。文字与为人的关系，不止限于表象或所谓的风格，更在于文字所体现的内在精神，即对于外部人世的态度与内心的自我约束。

先生就是文章与道德结合的典范。先生的文章凝练饱满，这是他从老师那里得到的要诀，也是他对自己的期许。先生的文章考证严谨、议论风发，向为学者所称颂。严谨的考证固然是求是求真的基本准则，但在先生看来，考据必须服从于历史深层原因的探索，故文章必须就此发议论，有裁断。这当然有招致毁誉的风险，但他认为做学问如同做人，应该有一种担当精神。

先生奉信“行己有耻”，有严格的道德操守。国难当头，他坚持民族气节，于颠沛流离中，不屈身，不隳志，且一经承诺，即斧钺不避，故深为前辈师长所激赏与信任。先生于师长教诲，点滴涌泉，终身服膺，不因人事兴替稍失弟子之礼。他之所以能承袭传统学术的精髓，即在于学术传承不单是一种知识授受，而且是情感与理性的交融。

尤为难能的是，先生毕生浸透着一种平民本色。他承认个人所有的成就皆为社会之所赐，故以尽力回报社会作为自己的人生鞭策。由是我们又可以理解，先生从未讲求过养生之道，而生命力何以竟能如此旺盛，何以在进入古稀之后的二十余年，尚能激发那么巨大的学术活力。先生为人率真谦和，平易可亲。与后辈、学生交，皆视之如同怀，绝无矜持倨傲之态。甚而脱略形骸，杯酒交欢，寓薪火相传于春风笑语之中。先生这种

特殊的人格魅力，与其文字中蕴含的智慧和风雅一样令人景仰。

下面我们就来简略地回顾先生的学术历程。

一、从投身清史到学术研究的前沿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史学正处于由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的阶段，许多领域都产生了成就卓越的大师，斗艳争辉，形成一派空前繁荣的气象。然而，民国初年设馆纂修的《清史稿》，代表的仍是清史研究的古典史学^①。国内史学界对清史的系统研究，尚属一片空白，落后于日本学者。首先出来改变这一局面者，当属萧一山和孟森。萧著《清代通史》即明揭欲与日本学者稻叶君山的《清代全史》一争短长；而孟森则主要致力于清朝开国和前期史的研究，《明元清系通纪》的辑录即其结晶，《清史讲义》亦是影响深远的清代通史。二三十年代，萧、孟二人以各自的成就，为现代清史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他们作为“中国清史研究的奠基者”，是当之无愧的^②。

但在孟森去世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清史学的后继者似乎未能推出足以继往开来的成果，将清史学推向另一个高峰。究其原因，显然是受到学术发展必要条件与自身规律之制约。一个学科成熟之重要条件之一，即基本史料之发掘、整理与积累。而当时的清史研究恰恰缺少这样一个阶段。所以，中国清史研究的开创者必须承担起这项使命，孟森先生便是典型。但仅凭一二学者的努力，这项繁重的任务自是无法完成。孟森的学术成绩主要体现在清朝先世及开国史上，这又恰恰是他的研究最为精到的领域。然而在清史的其他领域，尚缺少这种开拓性的耕耘工作。这也为孟森之后中国清史研究者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史学研究发展的规律，无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史，往往显示出综合与分析这两大要求交替主导着研究的趋向和风气。在萧、孟二人之清代通史问世之后，必然会出现转入清代专门史及具体问题分析式的研究阶段，而不可能是清代通史的层出不穷。也就是说，清史研究要朝着深入细致即微观的研究方向发展。这也预示着清史研究将会出现多极化的展开，而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形成定于一尊的局面。只有在清史的几大主要领域和诸多专门史研究取得一定成绩之后，才有可能在新的基础上产生更深一步的综合研究。

王锺翰先生的清史研究，恰好适应了当时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他的为学次第及治学路径，不但带有鲜明的个性，同时也给中国清史学的发展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先生开始习学研究清史已是30年代末期，在他稍前，郑天挺先生和谢国桢先生的研究已经显示出这一时代特征。郑先生对于清代先世、清皇室血系及清初社会和宫廷风俗的研究，已非孟先生清前期史所能藩篱。而谢先生则从私家野史笔记资料的清理中结集为《晚明史籍考》一书，重启南明史研究的新局面。而先生步入清史虽在之后，却

^① 参见王戎笙：《赵尔巽与中国古典史学的终结》，载《庆祝王锺翰先生八十寿辰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又，1918年许国英编撰的《清鉴易知录》流传颇广，其体裁仿朱熹《通鉴纲目》。

^② 参见何龄修：《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一位杰出奠基人》，王戎笙：《萧一山和他的清史研究》，均载《清史论丛》第八辑，中华书局，1991年版。

非谨循孟、郑门径^①。他为学伊始，即在治学途径和规模上显示出自成一家之气象。这实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燕京大学历史系虽未有专治清史的名家，但邓文如（之诚）先生谙熟清代掌故文献，鲜有人能出其右；张孟劬先生更是《清史稿》的修撰人之一。正是他们将王锺翰先生引入清史研究之门。洪煨莲（业）先生的引得编纂与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皆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性的工作^②。他们先进的学术思想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不能不对王锺翰先生日后的清史研究产生巨大影响。先生重视清代官书和正史，除《实录》之外，更重视会典、则例以及政书中的典章制度。他的学士论文《清三通之研究》及硕士论文《清代则例与政法关系之研究》，均展现出这一特点。而晚年所撰《清代官制》实为多年积思久虑的结晶，故备受学者推崇。正因如此，他的清史研究具有坚实基础，绝无可能在一些重大问题的论述中发生误会，同时也使他的学术论文具有极大的厚实感。达到这一点，似易实难。即使在一些具体研究相当深入的当今，也很难有人对清代基本政治制度的掌握达到先生那样的程度。据先生讲，他之所以重视典章制度，乃得益于邓文如师的指点。

典章制度的研究，又显示出先生治清史的出发点，已不仅局限于单纯事实层面的考证，而必然要求深入到研究问题本质性的联系。由于命运的驱遣，先生后来未能静心从事清代制度史尤其是官制的研究，确实给清史学留下一大遗憾。但时代风气及燕大历史系诸位导师的熏陶，使先生治学思维得以超越单纯的考据，则是必然。

1948年发表的《清世宗夺嫡考实》一文，是先生的成名作。文章引征繁富，考证精确，剪裁得体，行文流畅，为史学界所公论^③。但这绝非仅仅是一篇纯考证的文章。从文章标题所揭，即知此文乃针对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而发，“从来论世宗事者，疑似之间，不免依违”一语，正为孟森胶葛于“嫡”之一义。兹所欲论者，非欲判定孟、王二文之高低得失，而在于《夺嫡》一文之立意。“以允初再立再废始，以阿、塞、年、隆终”，即将围绕胤禛继位前后所有重大疑问皆与夺嫡相联系，伏因后果皆由夺嫡一以贯之。仅此而论，《夺嫡考》的基本思维取向就不是分析，而是基于分析之上的综合，这恰与孟森《入承大统考实》形成鲜明对照。按先生自己的说法，孟森认为“将世宗之嗣位，与雍正间之戮诸弟，张皇年羹尧及隆科多罪案，皆意其并为一事，遂坠入五里雾中，莫能瞭其实状。”^④先生于《夺嫡考》指出，孟森将各案分离，乃去真愈远，“此则适得其反。故与本文结论迥乎不同。”后来先生在《自选集·序言》

^① 何龄修：《悼谢国桢先生》，载《清史论丛》第五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文中以王锺翰先生列为“第二代的清史学家”，而以郑天挺、谢国桢“是第一、第二代清史学家之间的承先启后的学者”。据先生生前言谈，似并不认可这一定位。

^② 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见《文化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③ 杨启樵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页）一书中说：“王锺翰先生的雍正篡立说，共有两文：《清世宗夺嫡考实》和《胤禛西征纪实》。这两篇似较孟文影响更深：孟文间有剪裁失当处，如上谕、传记整篇照抄，以致散漫芜杂，眉目不清。王文则以丰富的史料作后注，使本文精炼可读，是不可多得的佳构。”杨先生又在《康熙遗诏与雍正篡立》一文（《清史论丛》，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中说，先生“四十余年前有关雍正夺嫡的两篇宏文，时至今日，依旧是探讨这个问题的必读之作”。

^④ 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载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19页。

中自道：《夺嫡考》是“将雍正诸弟与隆、年诸案综合起来研究，是从问题发展的必然联系来思考的。”不论《夺嫡考》的一些具体结论将会受到何种质疑和挑战，但其体现的思想方法，已完全具备了现代史学的特征，这是毋庸置疑的。就上述意义而论，《夺嫡考》是将考据与史论结合的典范，对后人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尤可注意的是，先生在后来改定的短序中对此文的宗旨所作的明确提示，其云：“尝读清史，总觉有同于元史者一点，即由帝位继承而起纠纷。盖满洲风俗似蒙古，多立爱立少，不立嫡长，与之不无关系。康熙为清最隆盛之时代，而夺嫡之争最烈。父子兄弟之间，视同敌国。后来引为殷鉴，不立太子。然乾隆以后，每当爱立，则有齟齬。关系爱新觉罗一家盛衰者甚大。”^①可见此文虽仅就世宗夺嫡一事始末而作，实则以此为关键，进而探明清代皇位继承制度演变及纷争之根由。而文章的附注对康熙朝太子预教礼仪考证尤详，列举有关史料甚至有今日之专著所未及者。世人论清代国祚较元长久，往往归诸秘密建储之制，于此多有溢词，以为胜出中原王朝传统储贰制度多矣。王先生综观清代历朝更替史实，对此说不以为然，他特于注中指出：“其实密建之制，自乾隆以后，并未见诸施行。”“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诸帝之立，并未预建，自是事实。”换言之，清代以秘密预立而得位者，乾隆一人而已。足见世宗惩康熙末年之失，创秘建之制，乃一时救急之策，实未形成世世相承的家法。以今日所见档案，先生的结论或过于斩截，但其基本观点，则依然无可动摇。在先生看来，清代入关之后的传位之制，既未能固守祖宗家法一成不变，然亦绝未幡然改从汉制。这是他以深刻的通观得出的结论。可以说，先生很早就准确把握住清政权中的满族性质。这一点恰恰是时下清史研究中所忽视的地方。

一般而言，由正史官书入手以治清史，其利在易于掌握一朝兴衰大势；而其弊则在治史者应有的批判立场易为统治观念所夺。孟森治清史之所以成功，原因之一即在以《东华录》质疑《实录》^②。然孟森论著中于清朝地位颇持回护，于其历史弊端忽视甚多，也是显而易见的，恐不能仅将此归结为力矫当时排满之风所致。而先生治清史所表现出的质疑批判精神无疑更为彻底。从《夺嫡考》及稍后发表的姊妹篇《胤禛西征纪实》来看，先生对有清一代的质疑和批判，已经不仅限于对官书文献，而是透过纸面文字直逼出清王朝必然于官书作伪的本质，乃在于清政权的基本性质和民族特征。由此可见，先生治清史之所以成功，首先在于思想上的超越之处，而手段固在其次也。他不取以满洲统治者个人气质决定王朝幽明的帝王史观，实已步入异质文明的冲突融合的现代观念，并以此来承接二十年代史学新思潮。我们不能不说，这既得自燕大邓、洪、顾诸位前辈的教诲和熏染，也是其赴美两年之后思想更新的结果。《夺嫡考》一文以附注来承载大量的铺述、考证，使正文于繁富中求简练，于曲折的史实中体现思路的畅达，正文与附注，相得益彰。从中明显看出受到洪业先生所作引得各序的影响，这也正是西方伯希和一派风格。

^① 《王锺翰学术论著自选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页。

^② 前引《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一文云：“清之改实录，乃累世视为家法。人第知清初国故，皆高宗所删汰仅存，殊不知清列朝实录，直至光绪间犹修改不已。其经蒋氏《东华录》所录者，固已异于王《续录》时所见之本，而王《录》成于光绪十年，偶一与《实录》库中之官本对勘，又删去重要史实甚多。”

自燕大本科期间首次发表《辨纪晓岚手书四库简明目录》到《夺嫡考》、《西征纪实》，先生投身清史研究已十年有余。其间虽因战乱颠沛流离、辗转求生而被迫一度中辍，而先生以承担清史为职志、为民族争荣誉之心却未曾稍息，云其坚韧卓绝，实非过誉之辞。十余年潜心浸淫，他继承了传统史学必备的版本目录训诂考据手段，还掌握了满族语言及英语、日语，这是他日后得以超出中国清史奠基一辈的优越之处。利用满语系统地研究清史，并能与海外学者进行学术对话者，国内当推先生为第一人。而更重要之处在于，他的研究思想不仅继承中国史学求实的传统，也融入了西方史学求真的精神，即要求在更高的意义层面上来重构历史的价值取向。先生是孟森之后重新将清史研究与国际学术接轨的先驱。《夺嫡考》发表后，受到国内的叶遐庵和远在美国的洪煨莲师的一致激赏，恰恰说明先生的清史研究不独为国内学者所推崇，同时也为海外汉学界所接受^①。

先生后来因国内大学院系调整转入满族史研究，就个人主观而言，应属颇不情愿。但先生却能迅速在满族史上取得进展，则不能不归结到其史学思想的先进和对历史理解的深刻。史学研究的多元性及历史构成的多重性，实际早已植根于其思想之中。孟森离去之后的十余年，正是先生从起步到崛起的阶段。毫不夸张地说，此时的先生已站在清史学的最前沿。如果不是改而研究民族史，如果不是后来的政治风波，我们完全可以预料，以先生的学术积累和思想高度，极有可能在五十年代，就会由他来将清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遗憾的是，这样的局面并未出现。以行政手段强行干预学术，对先生个人而言固然是一种伤害，对中国清史学的发展，又何尝不是一大损失。

二、唯物史观与清前期史的新探索

新中国建立之后不久，掀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热潮，开展对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与全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王锺翰先生以极大的热忱来接受新的世界观，积极学习掌握历史唯物论，并以此指导自己的史学研究^②。就先生个人而言，有两种因素影响着他五十年代的清史研究：其一是对全国少数民族的普查，其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为指导，对中国历史，包括各少数民族的历史进行研究。1957年结集的《清史杂考》，除上述《夺嫡考》、《西征纪实》之外，都是他在新形势和新思潮下的研究成果。

必须说明的是，“反右”运动之前，学术界的政治空气虽日益浓厚，但尚未至于对正常的学术研究进行横加干预、野蛮禁锢的程度。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人才荟萃，仍保持着彼此探讨切磋，相互激励的良好学风。洪煨莲先生虽远在美国，然音讯尚未断绝；邓文如先生依然健在，存问如常。此一时期，先生情绪激昂，自我期许甚高，这在他的

^① 前引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写道：“洪先生晚年对他在燕京大学所培养出来的几位史学家常常称道不置，如齐思和先生的春秋战国史、聂崇歧先生的宋史、翁独健先生的元史、王锺翰先生的清史，都是洪先生所激赏的。”

^② 参见《王锺翰手写日记》，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2005年印制。

《甲丁日记》中反映得至为明显^①。正因先生是以一种积极的姿态来适应新的政治和学术环境，同时旧日的优良学术传统仍得以继续保持，所以在短短的几年内，依然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这是一个对环境变化持抵触或适应度较差的学者所无法想象的。从先生身上也反映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单纯、勤奋与执著。

这一时期，先生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明代女真人的分布》（作于1955年，未收入《清史杂考》而收入《清史新考》）、《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三篇论文之中。正是这三篇论文，代表先生在学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使其清史研究从以往所谓传统的正史、政治史而转入满族史；从正统的王朝史上溯到清开国的前期史。就先生个人而言，当然是对于过去研究领域的拓展，但其意义并不止于此。

明代女真的分布和满族社会形态的研究，同时也使先生置身于当时史学界所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即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之内中央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问题。这是任何一位史学工作者，不论其具体研究属于何种领域，都不能不关注的历史主题。借用王国维的说法，我们可以说，一代有一代之史学，每一时代皆有其成为热点的学术主题。那么，新中国建立的新的政治体制，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周边少数民族空前的向心力，必然会将民族学、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而作为基本奠定中国现在疆域的最后一个专制帝国的清王朝，对它的研究，在当时势必也将置于这样一种大学术背景之中来发展。那种认为先生自五十年代即脱离了“正宗”清史研究的看法，不能不说是固守旧习的成见。

清代开国前期史是孟森先生开辟的学术领域。他的《明元清系通纪》，和另一位政治观点不同的史学家吴晗后来所辑录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不约而同地注意到系统整理满族入关前的文献记载，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恰恰反映了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到清前期史对于整个清史研究的重要性。孟森在《清史讲义》中，将对清前期史的研究归结为两点：其一，“明之惠于属夷者，以建州女真所被为最厚”；其二，“前史无论何朝，其开国以前祖先之事实，未有如清之先世，彰彰可考，既详且久者也。”^② 这确是最基础的，但也是具有前瞻性、开创性的工作。欲想在此基础上实现超越，实非易事。先生从事清史研究以来，之所以迟迟未能进入此一领域，或许与此有关。另一方面，孟森和后来的学者也都从明史研究中确认一个事实，即明朝自宣德以后，已将奴儿干都司从辽远的黑龙江入海口撤回至开原，并从正统年间开始沿山海关至开原向北修筑边墙^③。那么，明中期以来对建州女真及其以外的其他东北女真的统辖范围如何，便成为亟须进一步解决的问题。王锺翰先生所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一文正为此而发。故此文开宗明义：“在清王朝的奠基人努尔哈齐兴起以前的女真诸部，从

^① 参见《王锺翰手写甲丁日记》。

^② 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2—373页。

^③ 孟森《女真源流考略》一文即云：“女直自正统后，止有亡失故官，无更置新职之事。且建州渐横，明无馭边之方，奴儿干都司已撤至开原以南，领土之名系虚有，又何从增置卫所。”载《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明修边墙一事参见张维华《明辽东边墙建置沿革考》一文，作于1934年，载《晚学斋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版。

14世纪末到16世纪末大约200年的时间，他们究竟分布在今天东北一些什么地方，这是我们很想知道的一个问题。（这）不但对当时女真诸部所处的社会阶段，而且对以后满族的形成和发展等问题的研究都是有很大帮助的。”从先生的《甲丁日记》中所记载有关此文的思考和撰写过程，我们可以确知，此一问题的研究只是先生宏大的满族史及清前期史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

明朝在东北所设置的300余卫所的名称、时间，需从史籍中重加检索，本自不易，要一一确定其与今天地名相吻合的地理位置，则更为困难。日本学者和田清在其名著《东亚史研究·满洲篇》中，对此问题已有开拓性探讨。在此基础上，先生重检《明实录》，而且以《辽东志》、《全辽志》、《满洲源流考》相互对勘，从而将明朝约二百年间于东北设置的卫所系统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变过程作了更为系统、全面的概括。我们仅据该文附着的《明代女真卫所简表》可知，明正统以后陆续于东北地区设置凡174卫，充分说明即使奴儿干都司撤至开原之后，明朝仍在东北广大区域内行使统辖权。无独有偶，较先生此文早一年，美国学者亨利·赛瑞思（Herry Serruys）发表《永乐时期中国与女真的关系》一文。从两文的标题可知，彼此的立意迥然有别。先生是着眼有明一代200余年对周边少数民族区域建立统辖的历史事实。《分布》一文以确凿考证进一步澄清历史事实，“从而粉碎了清统治者以及受了清王朝封建影响的民族主义者倾向认为明的势力未能越过今开原、铁岭以北一步，而满族的前身女真却是与汉族从未发生过直接关系的另一部族国家的传统说法。”诚然，这一结论在孟森那里已经出现，但孟森的结论强调的是满洲开国者爱新觉罗一姓之世系及与明廷的关系，而先生则更突出明廷对整个东北疆域及生活其中的全体女真人的统辖。二者的差异是不难体察的。

必须指出的是，这篇论文是先生的未完成稿，而不是最后的定本。他于30年之后为此文写的《再记》中说：“当时所据仅限于《明实录》及明清的官私汉文史料。”及至“1959年秋赴沈阳，参加辽宁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满族简史》的编纂工作，三年期间，曾翻阅朝鲜《李朝实录》一遍，辑录有《朝鲜李朝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约20万字；又曾用罗马拼音过录文谟阁所藏《满文老档》全部108卷。阅读辑录，目的在于为编纂《简史》搜集补充资料，而对明代女真卫所的建置、迁徙与损益因革，亦稍稍注意及之。但重新改写，固未遑为之一详考也。（中略）此则敝帚自珍，新篇期诸它日耳。”^①遗憾的是，由于后来年事渐高，先生再也无此精力为我们写出新篇了。

《形态》与《过渡》两篇论文，对满族入关前的社会形态及其发展作了深入的探讨。从文章标题即可知，这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为指导的研究。今天，五种社会形态说早已被学界弃之如敝屣，因为它在解释中国历史的演进时确实表现出枘凿不合。但问题是，历史唯物论是否已成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桎梏？能否由此将国内学者几十年在此观念下所进行的努力探索彻底否定，认为毫无价值呢？五种形态说本身还有无合理的内核？历史唯物论对历史研究还能否作为借鉴？谁曾证明，纯粹的考据和现代层出不穷

^① 王锺翰：《清史新考》，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

的各种方法论就一定高出历史唯物论的方法论一大截？这些恐怕都需要平心静气的讨论^①。就满族入关前的历史而言，日本学者的研究早于中国，其细致程度确实亦非国内研究所能及。但日本学者对清前期史的研究就是不易之论吗？中国学者的研究一定要遵循他们的路径才是正确的吗？须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在日本学者中也曾是风行一时的流派，何以中国学者尝试以此进行研究就会遭致眼下如此轻蔑的否定呢？这难道不同样是虚无主义的表现吗？

我们今天回顾老一辈学者的经历和成就，不能不考虑到一个基本事实，即他们在尝试以历史唯物论指导历史研究时，并没有抛弃自己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而借空洞的理论代替踏实研究的毕竟是极少数。尽管以今日的眼光来看，老一辈学者当时的研究留下了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绝不能因此而将他们的研究全盘否定。这是我们现在认识先生《形态》和《过渡》两文所应持的态度，因为这两篇文章实不愧为当时一批明清史及满族史学者对此一问题研究的代表作。两文所利用的史料包罗明朝、朝鲜的官私记载以及清朝所修《实录》和《满文老档》。如此丰富的史料，为作者提供了进行细致分析的坚实前提。这是先生首次在研究中运用满文史料。

两文每论一朝，必先述满族所具备的生产力水平，生产生活状况，生产关系包括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来源、占有，继而论及分配关系，然后进而论述建立在物质关系之上的社会阶级结构以及法律关系。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历史唯物论对先生虽是一种尝试，但显然已超越了中国学者在二三十年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这反映在先生论述满族由部落制迈入文明社会阶段时，更强调满族前身所处的独特的历史环境，也就是说，他更强调“外部”因素对满族进入文明社会的作用。这与所谓外因必以内因起作用的简单化、概念化的理解，与强求各个民族社会形态完全一致而抹杀各民族独自特征的作法，是截然有别的。虽然奴隶制、封建化及阶级这些概念影响了作者本可达到的更合理的理论提升，如对诸申的社会地位的判断，但不可否认，先生已经给我们描述出当时所能见到的最丰富的满族社会发展史。我们仅举《形态》中对奴隶阿哈的来源为例，先生写道：“阿哈的第二个来源，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来源，是阿哈被允许结婚后所生的子女。满文中有‘乌津’（ujin）一字译作‘家生子’，此外又有 futahi（一辈奴）、furna（二辈奴）、bolhosu（三辈奴）、genggiyesu（四辈奴）等字。均系阿哈而言。”没有能力利用满文史料，简单以概念代替史料分析，无论如何是不能获得如此深入的认识的。而先生的历史分析，又显然是一般满族学研究所无法企及的。

还可值得注意的是，先生这两篇文章的立意。探明满族入关前的社会形态，意义不仅在于清前期史本身，更重要的是对日后进入中原建立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主体的发展阶段有一个准确而清晰的判断，为清承明制或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统绪奠定一个可靠的基础。简言之，满族的社会转型及与汉族的初步融合，是满族入关后与中原王朝统绪接榫的基础。为此，先生在《过渡》一文中写道：“但也只有在进入到辽沈地区以后大

^① 即以目前中国最权威的《中国经济通史》（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为例，吴承明先生在该书总序中写道：“各卷都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有基本一致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本书认为中国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嬗递。”可见历史唯物论在中国史学研究中仍有很大影响。

约20年期间，满族社会由于它本身发展的固有因素，再加上不由人们意志所能自由改变得了的外来影响，所有这一切，才能促进它大踏步地、加速度地转向封建化这一历史过程。”又说：“将这两方面（指内外因素）综合起来加以研究和分析，可以肯定满族之所以能够进行统治全中国竟达三百年的局面，不是什么不可以理解的偶然现象，而是有它自己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根源的。”无可置疑，先生的满族史研究，一开始就是将其作为清史的一个起源来对待的。清朝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非但不同于辽、金，即使元朝亦不能与之相埒。对一个统一中国近300年的王朝的前期史缺乏充分的把握，是无法对有清一代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深刻理解的。先生后来反复对他的学生强调，不论研究清代哪一个具体方面，都要求熟习清前期史。清史的开山大师孟森曾云：“金一代自有正史位置。”^①既然如此，对清前期史、满族史的研究，怎么会从正宗的清史研究中筛选出去呢？恰恰相反，对清前期史研究的深入化，不仅开辟了先生个人研究清史的新阶段，其将清史满族史融为一体的独特的研究，正是以此为起点，同时也应视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清史学新发展的一个标志。

需要补充的是，清社既屋和随之而起的民族主义排满风潮，确实对清史研究产生过影响。可能仅除孟森之外，对清代三百年的统治，史学界都曾一度有否定过当的倾向，但这并未长期妨碍中国史学家们理性的清明。1941年，困守北平的陈垣先生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书序言中写道：“自永嘉以来，河北沦于左衽者屡矣，然卒能用夏变夷，远而必复，中国疆土乃愈拓而愈广，人民愈生而愈众，何哉？此固先民千百年之心力艰苦培植而成，非幸致也。”^②如何以超越夷夏的传统观念，用现代民族和国家理论来解释中国多民族国家分合的历史，将历史的理性与批判精神相结合，重建新的历史价值系统，在五十年代，这一任务显然应当是由先生这一代的学者来承担的。不幸的是，从1957年的“反右”运动开始，中国清史学的发展不断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和冲击。结果是浩如烟海的史料无人去系统整理，加上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极“左”的学风，使清史研究成果异乎寻常贫乏，甚至长期荒芜。中国清史学的发展不得不走上一条崎岖而艰难的道路。

三、晚年学术新境界：融满族史清史研究于一体

《清史杂考》面世未久，先生即因“反右”运动受到株连，此后20年未能发表一篇论文。即便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先生仍钻研不息，积极为后来的学术研究进行积累。这20年间，有3件事特别值得一提：1959年参加辽宁少数民族历史调查组，在此期间完成了前述20万字的《朝鲜李朝实录中之女真史料选编》，其后接任通纂完成《满族简史》一书；1971年至1976年参与《清史稿》的点校；最后是1976年至1980年独立完成80卷《清史列传》的点校^③。正是多年的亲身社会实践和基本史料的沈潜

^① 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8页。

^②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外宗教史论著八种》，列入《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下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68页。

^③ 详见《王锺翰学述》一书相关章节，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